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不堪回首】	一个“狗崽子”的迷惘	李 斌
【往事非烟】	在毛泽东逝世的日子	钱文军
【当事者言】	清华大学武斗的结束（下）	陈育延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不堪回首】

一个“狗崽子”的迷惘

• 李 斌 •

◇ 惶恐的红卫兵经历

1966年8月，我看到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便也想当红卫兵。当我戴上自制的红袖章，立马迎来工农子弟的冷眼，我心里沮丧，感觉自己的地位从此不一样了。好在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很快分成了两派，造反派从属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不太讲究出身，我就混入了其中。我会画画，组织了“钢刀”木刻战斗小组，创作了不少版画宣传品，数《造反有理》最出名。记得那天，我把整张的胶合板铺在地上，随便画一画，就拿木刻刀刻起来，再用全开的大红纸印出，画面上红卫兵右手高举《毛泽东选集》，左手紧握“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大旗。没过几天，来了一位老先生，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门收集红卫兵的作品，我就给他了这幅《造反有理》。1967年的4月号《人民画报》封底整版登载了这张画。

我有一位从小就同学的亲戚叫方群，他的姑奶奶，我称姑太太，同里弄住着，与我常见面，十分亲切。“文革”中姑太太被迫在里弄里扫地“劳动改造”，我见到她，察觉到她想与我打招呼时，会以冷眼逼回去。我至今忘不了那一瞬间：她迅速地垂眼低头，转过悲凄的脸。前不久方群与我聊及“文革”琐事，见我诚恳反思当年言行，直率提示了另一桩被我完全遗忘的丑事：我的母校原名是孝和中学，据说是张春桥质疑王孝和烈士有变节行为，才改为建设中学。曾是新四军干部的倪爱史书记，有一天看见我在画石膏素描，大加赞赏：

“你好好画，将来可以成为好画家呀！”。她在“文革”初期难逃磨难，那回全校批斗校领导，方群看见我躲在主席台边缘，当众人高呼“打倒倪爱史”时，负责押解的红卫兵按下倪老师的头，我伸手也按了一下她的头顶，不重，只是轻轻一碰，随即收回。我被提示后，隐约想起似乎有过那个情景，很像我的行径，符合我的下意识：我不忍下狠手，她毕竟是我尊敬的师长；我想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便得有所表示。那时的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在“文革”中成为骨干分子，犹如以往一贯的我，总想担任主角。虽然“狗崽子”的阴影约束着我的激情，但只要有可能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我会义无反顾。犹如学雷锋运动中，我曾拼命想

出点子去做好人好事。一是像雷锋那样将所作所为写入日记、写入思想汇报；二是不会单独行为，带领同学们一起干。总之，不能白干，要让人知道，如同当下作秀。我还记得，“文革”初，在学校里我无法尽兴表现，回到自家弄堂，居然向居委会主任建议，要将全里弄地富反坏右分子集中起来游街，张主任为难地望着我，突然反问道，是否也让你爸爸一起出来呢？顿时我头脑空白了几秒：竟然忘了我爸爸是右派！我回了一句：“那就一起游街么……”声音低沉了不少，张主任拍拍我的肩膀，离我而去。我悻悻地愣在原地，内心深处喃喃自语：谢谢你张主任！

1967年7月，《红卫战报》从“红革会”、“红上司”手中转变为“红代会”的机关报。报社一开始设在《文汇报》社，后来到《解放日报》社，再后来是陕西南路团市委，最后落脚于《青年报社》。我在《红卫战报》当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因“出身不好”，心里忐忑不安，觉得是“混”进了《红卫战报》。我和《红卫战报》的头头儿李锐说了自己的忧虑，他说其实我们这里好几个人出身都有问题，我也就放心了。《红卫战报》期间，经历了好多事，比如攻打“上柴联司”，我潜意识到这类事件危险，没有到现场。那天傍晚我路过平凉路许昌路口，发现乘载大量拿铁棍工人的卡车由东往西行驶，我当时的立场当然是站在“工总司”一边的，发现有很多路人谩骂车上的工人，有工人下来对骂，路口开始混乱。我记得我是跑了五个街口，一直奔进学校，把建设中学的“红东北”和长阳中学的“红东北”召集起来，以方阵队形分别沿平凉路和长阳路跑步到现场，将围攻“工总司”的那些人抓起来，现场就有人拿铁棒打他们。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我反感武力相向，但这场面却是我造成的。

后来我还知道，这个事件发生时，毛泽东也在上海，他坐在轿车里，在外滩观望市革会门口的工人武装队伍，这是我第二次接近毛泽东，第一次当然是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期间。9月份我去了南京，亲戚对我讲，你千万不能北上，西城纠察队等着你呢，他们等的就是你这样的狗崽子。我吓得从南京折回上海。11月，我觉得不至于那么猖狂了，应该安全了，我再次北上，没想到碰到安亭事件。我从上海到北京，走走停停48小时，到北京两手脏兮兮，像熊掌一样漆黑。

住在北京宣武区委的大礼堂，我第一次见识到不同地方人的生活习惯。感觉齐齐哈尔人像农民，惊奇他们的“裸睡”。只见他们早上一起身就拿着大棉裤在腰围处不断抓东西往嘴里送，我不知道他们吃什么，像吃花生、瓜子，后来才知道是咬虱子。有一次和几个福建人发生口角。他们第一句就问你是何出身，其实我可以说出身工人，但是不敢撒谎，说是职员，他们马上质疑我：“什么职员，职员最复杂。”这几个小子，本来是我瞧不起的“土包子”，这一下就把我镇住了，我作为“右派分子的狗崽子”，躲开了。

11月25日，那天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3点钟起床，来到长安街的东边，在那儿排队等着，好几个小时过去了，9点钟，队伍开始行进。等经过天安门，大家已是泪流满面，只知道呼喊“毛主席万岁”了。我只望见天安门城楼上两个色块：毛泽东的红脸，林彪的白脸，别的什么也记不住。天特别冷，到接见那时辰还好些，一定是毛泽东的阳光把我们给罩住了。一边仰望毛泽东，一边问别人几点，再低下头在语录扉页写上“11月25日上午9点40分16秒，我见到了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在《红卫战报》工作的时候，还经历了炮打张春桥事件，我端着相机，好像在公共汽车上，外面的墙上只要有大字报我就拍。我都弄不清，我怎么在校园里也是坐在车上。反正复旦大学被我拍了个遍，用去三卷135胶卷，全是密密麻麻炮打张春桥的标语和大字报。

《红卫战报》不会主张炮打，我们是把它当“罪证”收集起来。那时候我愚忠得很，觉着我

只要好好画画，好好拍照，已经是“狗崽子”最好的境遇了，现在想来，那种满足感一直伴随着惶恐。

#### ◇ 愚忠塑造着我的奴性

“文革”中，我为获得那种满足，有时会主动迎向羞辱，甚至是自己震慑自己。我怨自己出身不好，若出身好的话，也可以和“红五类”同学一样，去抄别人的家。那时，我家经济条件差，妈妈在里弄门房看大门。有一天晚上，来了一队红卫兵要抄家，抄的哪家，我不认识。我妈妈请他们到里弄的公共食堂休息，她回家煮了一大锅红枣赤豆汤，由我端去做他们的夜宵。领头的是我小学同学，是成绩很差的那种学生。我是“狗崽子”，他是红卫兵队长，那天他却不好意思，始终不敢抬头看我，我心里也是好大的不舒服。

1968年5月，陈琳瑚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参加我们“红代会”成员会议，说了许多，我只记得一句：“你们要准备当一名职业红卫兵。”我的理解是，他希望我们坚守岗位，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久，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招兵，我作为记者在台下听得真真切切：“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按征兵标准招收兵团战士！”我的心凉了半截，征兵时我因为出身问题未被录取，好容易有进兵团的机会，又泡汤了。我夹着自己的画作和照片去沪东工人文化宫招兵办事处，负责人见了我的作品马上表态：“你被录取了。”“我父亲是摘帽右派。”“重在政治表现。”我喜出望外，甚至得意忘形：虽然自己是“狗崽子”，但我当过大队长、上海市优秀少先队员、学生会干部、红卫兵机关报编辑，现在无需政治审查就可以当上兵团战士，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下乡继续革命，与农村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以此作证：我下乡并非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的，我是以红卫兵的姿态去农村继续革命的！1968年8月11日，我们穿军装，戴红花，在公共汽车上招摇过市。杨浦区的平凉路上尽是夹道欢送的人群，到火车站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车上，我依然是《红卫战报》的记者，还没有完全卸职，带着相机一路拍摄过去。兵团的人要留我在团部。我想他们是看中我的相机了，需要我做宣传工作，需要我去画画。我把相机交还给了随车一起来的《红卫战报》的李平，然后就和团里招兵的人说，我没相机，不去团部了。最终和建设中学的同学们一起去了最远的没有电灯的20连。

我在20连当农工，经常出版报，写大标语，画毛泽东像，满脑子想的还是“文化大革命”。每星期，我们建设中学的知青会到21连团聚，讨论的话题几乎都与连队的“阶级斗争”有关。聚会开头唱《东方红》，结尾唱《国际歌》，严肃的状态如党的“九大”。然而有半年的光景，在我一副风风火火的革命者嘴脸背后，我的内心阴冷惶恐：离沪之前我做了一件让自己不安的傻事……心里忧虑着傻事会导致何种结果。

1957年我的父亲李宝仁在上海纺织管理局财务科被打成右派。那时我刚加入少先队，选大队委员时，本人获全校最高票却未被认定为大队委员，接着几年都是这样。四年级我从大队辅导员贾老师处得知，这与父亲是右派有关，还告诉我：“党的阶级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你没当上大队委员，是有成分论，还让你当中队长，是重在你的表现。”我立刻对父亲产生“仇恨”。我和姐姐当面指责父亲：“你反党害得我们一个入不了团，一个当不上大队长，我们要与你划清界限！”从此，“和父亲划清界限”成了我口头、笔头的誓言。我五年级的十一前夕，父亲回家还未进门就兴奋地告诉我妈：“月华，我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多么像一句台词！我听罢冲下楼去直奔锦州路小学，老师与校领导都激动不已，还拥抱了我一下。不几天我就当上了副大队长，抚弄着三条杠标志，我心中对党充满了感激之情！打那以后，我走在里弄里，特别昂首挺胸。因为在这之前，我家门口曾被贴满大字报。我垂头丧气过，虽然邻居对我不错，不曾嘲笑我。

“文革”开始了，我时任建设中学学生会宣传委员，眼看着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全上海有门或像门的地方刷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的对联。有些墙上还有“红色恐怖万岁”的字样。我心中慌乱得不行，我在学校的优越感瞬间消失，坠落于万丈深渊。

#### ◇ 自作自受的大义灭亲

红色恐怖中我真的认同了“血统论”。我对父亲的“仇恨”与日俱增！校门口一条醒目的大标语给我指出光明大道：“狗崽子们，回家造反动老子的反去吧！”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姐姐给我发电报：“将家中的四旧除掉！”我立刻让母亲翻箱倒柜，一本《日军侵华暴行图录》被我寻得，上面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图样。母亲说这是远房叔叔李寿人给的，他是国民党军官、抗日英雄，1958年死在劳改地青海。我认定这是“四旧”，还是反动军官留下的！立即点火将它烧成灰烬，灰烬扔进阴沟，用自来水冲洗得一干二净。哪知晚上又接到北京电报：“家中四旧不要动，等待红卫兵抄家！”后来我有些失落：红卫兵直奔左邻右舍，唯独不来我家。不久姐姐再来电报：“询问父亲，摘帽后有无对党不满！”老爸遵命回忆，还真检查出六大“罪状”。我至今只记得一条：“摘帽后同事查到早年有过发明并记过功，赞叹我李宝仁真有两下子，我随口应道：嗨——败将不提当年勇啊！——这是我的反动言论。怎能与共产党论胜败呢？”我让父亲写下罪状，外加自我反省，再交到我手中。待我来到齐齐哈尔路上棉十五厂，请几位造反队头头儿仔细看了一遍“交代书”，他们是一脸的不解：“你这位革命小将，本来你爸爸没事，你这么一来，不是没事找事吗？”国棉十五厂除了我父亲，还有一个右派，两人都能写文章，是两派双方的“狗头军师”，我问过父亲，摘帽右派，还参加造反队，不是混入革命队伍吗？他说，我不就是想表现好一点儿，为你们着想吗。面对造反队长，我佯装大义灭亲状，内心却骂着自己：真是十三点！

打那天起，我心神不宁……

到北大荒近半年，父亲来信了：“我已被造反队内部除名，没有批斗我，放心。”刚收到信的那几天，我激动不已，那些日子我没有日记，若有，一定会这么写：“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父亲的宽大处理，我要更加忠于毛主席，报答毛主席的恩情！”

在上海我有“狗崽子”的阴影随行，在北大荒，我觉得角色不一样了。与当年土改时期出身地主的革命干部一样，回避家乡，回避家族，老爹在江西被枪毙，儿子跑到东北镇压别的地主。我也是这种心态，在北大荒连队里斗地富反坏右，口号喊得好张狂。以后还参加过工作队，下连队蹲点，跟着中年干部整那些“搞破鞋”的，审问他们时，逼他们讲细节，怎么干的？怎么弄的？我已20岁，想听，又不好意思。后来我自己学会整人了，那回逮着一个早先来北大荒劳教的北京青年，他住在连队边缘的破房子里面。有人向我们汇报，说他某天晚上找了男男女女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黑灯瞎火的。据说，他是小时候偷家里东西，被外婆送到派出所，派出所再把他送黑龙江劳教，就留在北大荒了。他比我大不了多少，我盘问他到底干什么了，他说没干什么。我说为什么关灯？他说点蜡了。其实我希望他能说出个一二三，特别想知道细节，现在想想真是卑劣。在兵团参加美术学习班期间，我还扬言要批判“北大荒版画”。我的言行，曾对不少人造成过伤害。

珍宝岛战役后，东北地区为加强国防力量，增建抚远到二龙山的国防公路。兵团承接了工程。九个月后，我成了修路工人，依然是以画画写板报为主，干活的日子数得过来。

#### ◇ 择友的彷徨

半年后我回团在学校教美术，常在团部机关帮忙，认识了生产股的黄琪玲先生。他和其父黄翔先生都是黄埔毕业生，1949年黄翔在北平南苑机场起义，同年4月黄琪玲由武汉驾机起义，一直在石家庄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任军事教员，1958年因右派言论被发配到855团，“文革”中被指控为“国民党空投特务”，惨遭毒打酷刑，甚至头部被按在火炉上烤脸，左眼几乎失明。他夫人孙灵舒，曾在北京八一小学当教师，标准的民国知识女性，典雅的容貌远胜《良友》的封面人物，“文革”中被剃过阴阳头。女儿黄玲在855团上学，听过我的美术课，后来成为央视的主持人。凡与老黄打过交道的人，都称赞他是个有良知的大好人。“文革”前，他建煤矿、设副业厂、造职工屋。“文革”期间下放到七连劳动改造，为解决饮水问题，带领众人打出百米深井，杜绝了该连多年来“大骨节病”的流行。我喜欢与他聊天，但总听到有人议论：黄某历史问题多多，黄家社会关系复杂。我每每在忐忑不安的心态中与老黄交往。

1972年我回上海路过北京，曾去黄翔家拜访，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中将又是摄影家的老人拿出许多照片让我观赏。我看着照片，打量着这被肢解了的四合院：隔墙离门窗很近，窗外杂物堆砌，窗内阴暗拥塞，本是一家人独居的大院被分割出去四分之三。

我忘了为何而去，只记得心里有点儿慌乱：这位老者曾是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我不敢久留，匆匆一面就离开了，除了向黄琪玲讲述过，未敢告诉其他人。我评估这类拜访应该是有“立场”问题的。我生怕这个“拜访”会影响我入党。后来我从网上更清楚了这位老者的光荣历史：他是国民党92军中将军长，参加过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并赴缅抗日。30多年后，我见到了不少昆仑关大捷的照片，我以此为素材创作了《杜聿明血满弓刀·昆仑关大捷》大幅油画。我深信在照片里在油画中一定有黄翔将军的身影！

#### ◇ 9·13的震撼

我在团部，常见连队干部在那里开会，以往大伙总是嘻嘻哈哈，唯独1971年年底的聚拢，人人规规矩矩。记不清是哪位连长哥们儿告诉我：副统帅林彪摔死啦！我飞跑回教师宿舍，撩开门帘大叫，你们都给我起来，我有重大消息宣布！这帮爷们儿都已趴在被窝里，正探出头来看书。又是啥小道消息，勿吓人！我说你们不出被窝我就不说，说了不吓人你们就揍我！各位钻出被窝，我振振有词道：副统帅背叛伟大统帅，摔死在外蒙古啦！静音两秒钟，十多只铜铃大的眼球逼将过来，瞬间我被拖上大炕，众人乱拳齐下，打得我又疼又痒，大伙起哄：“反革命，这个反革命。”我挡着乱拳，挡着唾沫，仰视着一张张窃喜的怪相，突然大家停手，催我快说细节，我翻来倒去只有一句话：“林副统帅、叶群、林立果乘三叉戟逃离北京，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坠落爆炸摔死了。”“反革命反革命！”大伙喃喃自语，表情却很怪异。不几天，“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批判材料发下来了，这时期的批判会大家不再打瞌睡，按报纸广播的口径说上几句批判词，最喜欢大声朗读“纪要”中的不少名句，“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这几段我们都可倒背如流。

不几天上面又下达指示，要将林彪的照片全部上交。我急中生智：“可不能这么干，没有这些照片我怎么画林秃子漫画呀？”领导瞪了我一眼：“那只能作漫画参考用啊！”那些日子，我暗思量：毛主席不是明察秋毫吗，怎么将林彪看走眼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对他老人家有了一点点怀疑，但很快被自己纠正了：毛主席一定早就看出来了，只是想让林彪暴露一下。再后来江青被判处死缓，我不明白了：对毛主席那么忠诚的中国老百姓，为何对他的老婆却如此痛恨？我想不通毛主席怎么连最亲爱的人都管教不好？党中央文件又纠正了我：“林彪、‘四人帮’利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迫害老干部，制造混乱……”

## ◇ 扭曲的英雄主义

我在团部宣传股帮忙，主要是写标语、画幻灯，至今有印象的只有两部片子。一部宣传表扬因排除哑炮死去的韩春照，另外一部描写35团打火英雄集体。死了14名，负重伤者是7名来自北京门头沟的俊男美女，我看着这些英雄烧伤前的照片，想象着他们的脸皮被火焰吞噬，起泡，流油，脸上留下坑坑洼洼的焦皮焦肉……我坦白，我一边画着他们的壮烈，一边庆幸自己没有那样的遭遇。听说7位英雄被送回北京整了容，依然离原貌相差甚远。其中一位年纪最小的因脸庞丑陋找不到对象，某夜，他偷窥了女厕所，好在没有人责难他！

四年前，我认识了三师的北京知青×××，她在打火中重度烧伤，另外两位女战友当场死亡，出身工人的被迫认为烈士，出身不好的不被宣传，只作事故死亡论定。她本人在奔赴火场途中并不恐惧，简直是不管不顾地扑向杀人的烈焰。她以为这是一次机会，一次可以表现她同“反动”父亲划清界限的机会。后来她当然后悔，她渴望爱情，但她一再被冷落。她常年以泪洗涤着自己见不得人的脸面，她将一生的全部积蓄都花在了整容上。但她终究与曾经的美丽无缘，她年过花甲，至今未嫁。我正在创作一幅油画，画中人是成佛的金训华，他合十端坐。画的两边有对联：记住我！别学我！

同年另一件事发生在团机关附近，记不得是什么单位失火了。我们闻讯冲进火场，传递着装满井水的畏德罗（水桶），不一会，我听到裤腿咔咔作响，只见大家都一样，被井水湿透的裤脚，冻成了盔甲。团部现役军人大个子参谋长也来指挥救火，火场中传出一声声“毛主席万岁，不要管我，救火要紧”的呼叫声。烟火中一位哥们儿，双手抓着一根横在半空的长木条，龇着牙，使劲嚷嚷。参谋长走上前去吼道：“叫你妈了个×呀，你离地就一米高，你他妈的给我下来！”年轻的读者不要见怪，那时代就是这样，些许事实比想象的还要稀奇古怪。再举例，记不清哪个糖厂也着火了，报警者是一位上海知青，他在短期内成了救火英雄，但不久却被逮捕归案——他是纵火犯！查出事端的关键是人们在展览他的被烧坏衣裤时，发现内衣裤的损伤面明显大于外衣裤的损坏面。他为了当英雄，在弄虚作假上花了一番功夫，可惜不够严密，否则他的“英雄”形象不知会赢得多少人的眼泪。

谈及当英雄，我记起另一件由我们几位教师直接参与的救人趣事。

记得是冬天，我路过机关食堂，只听得救命声从地底下发出，我循声前往，认定是食堂门口水井底下有动静。我小心爬上井边的冰坡，探头下望，竟然是一位我很熟悉的知青。他有气无力地发出颤音：“快点儿，我快冻死了……”我回校招呼了几位知青老师，找了一根粗绳甩下井去，井下这位发出指令：“同志们拉吧！”我们四条汉子像拔河似的，抓住粗绳，使劲后仰。他个头不高，也不壮实，但泡过水又挂着冰碴，重量倍增。我们眼瞅着他快有出头之时，他喉管里冒出一串毛泽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累得屁颠屁颠的，他却由受难者突变成了呼口号的英雄，我忘了谁使了个眼色，八只手同时松了绳索，只听“通”的一声闷响，他又跌落井底。我们喘着气问他：“还下定决心不？”“不行了，快冻死掉了。”第二次减速了，不是大家怠慢他，实在是边笑边拉怎么使得上劲儿呢。我们的恶作剧导致我们的救生壮举未获表彰，但落井知青的英雄主义情结也受到了挫伤。

## ◇ 思虑中的绘画历练

1972年，我调到师部当美术创作员，任务就是寻找美术骨干，组织成学习班。我负责辅导学员们将草图修缮成画稿，然后把画稿送到佳木斯兵团总部，再挑出优秀的作者参加兵团的美术学习班。负责兵团学习班的是北大荒版画中最年轻的郝伯义先生。

1977年，我接到省里的调令，到黑龙江省美协当专业画家，直接由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1979年，我与调入哈尔滨市美术工作室的刘宇廉、陈宜明一起创作了连环画《伤痕》、《枫》与《张志新》。

“文革”中的中国美术，所有的画都变成了宣传画，只能为政治服务。要么歌颂毛主席，要么打击敌人。火爆的革命性把人性剔除，单一、刚硬、壮烈，没有私人情感，否则就是立场问题。毛泽东过世，“四人帮”倒台，我们画《伤痕》、《枫》的时候，开始回归符合人性的思维方式。《伤痕》发表以后影响很大，获全国连环画评选一等奖。《枫》讲的是一对互相爱慕的高中生，“文革”中分成两派，武斗中互相劝降。女生是战败的一方，跳楼自杀，男生后来也作为“加害者”被枪毙。其实武斗的真正原因与争权夺利有关。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谁在里面占多少位置，造反组织要分赃了。为了分赃，大家就要凸显自己对毛泽东的忠心，比谁更忠诚。讲穿了，就是利益再分配的问题。对大部分的年轻人来讲，没有想过这一层，他们想到的是对方有问题，认为对方对毛主席不忠，认为对方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威胁，而只有我们的存在，才能真的把毛主席保住。我们在画《枫》的时候，借助小说的平台，力图再创作，力争画出小说里没有提及的场景、隐喻。我当初在“红代会”和张春桥合影过，还给他拍过照片，《枫》的第一幅画就是参考“红代会”成员簇拥张春桥合影的狂热场面，极正面地表现他们，因为那时他们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正义的代表，是偶像，只是画成蓝色调。另有几幅有影射意味的，比如在屋顶上，“万寿无疆”的标语下尽是红卫兵尸体。

当时《连环画报》是中国美术界很重要的展示平台。那时候油、国、版画没有市场，不可能买卖，画家就靠画插图、画连环画挣钱。你要出名，就先画一套彩色连环画，经《连环画报》推出，迅速扬名画界。1979年8月份，刊登32幅《枫》的《连环画报》引起轰动，同时有人写信给中宣部，说这套画为“四人帮”翻案。其实画中缺王洪文。读者提出我们表现的太正面了。“这么一来，我们将来怎么教育孩子？我们怎么对他们说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第八期《连环画报》停刊了。要是现在也就算了，大家都不吭气了。可当时的《连环画报》编辑吴兆修女士，以编辑部名义写了信到中宣部，一周后中宣部将《连环画报》的编辑找去讨论这部作品。结果是收回禁令，继续发行。结论是作品的好坏不作定论。当时胡耀邦还写了批示，有点儿模棱两可，都是不作定论。这么一来《枫》名声大震，后来入选全国美展得了一等奖。一等奖只有三个，一个是版画，一个是国画，还有一个就是连环画《枫》。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教授还拿我们的《枫》做蒙太奇教材。遗憾的是，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其中主要的9张，其余在6年后被人窃取了。去年应出版社要求我用油画重新复制了一套。经全国三地巡展，现已出版问世。

1980年我画了油画《舍得一身剐》：红卫兵文斗彭德怀的场面。那幅画参加全国青年美展，得了二等奖。1982年我进入中央美院油画研修班，两年后毕业。1985年我开始申请出国。因为美国拒签，1987年我先去日本待了两年。一年学日语，一年在东京艺大进修。1989年4月中旬开始，我几乎没画画，买了一个大彩电，边看边录像。最后的那个清晨，淋浴中一股不可名状的悲哀终于爆发成失声的痛哭。1989年7月我赴美定居。

1998年我回国，2000年干脆回沪定居。现在我全心全意地画自己想画的画，题材多与反思历史有关。

除了创作，我还参与策展。一次是2008年的青春叙事——知青油画展，另一次是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修班展览。

#### ◇ 呼唤反思的感言

我写下以上的记忆片段，是希望年轻人能体味我们这一辈人在浩劫年代里，曾如何心悦诚服地舍弃个人价值，自以为献身给了人类最伟大的“解放”事业。后来我慢慢觉悟，敢于解剖自我了：我承认在那反人性的岁月里，自己充当过狂热分子的角色，曾向包括父母在内的“阶级敌人”施行过语言暴力。部分原因来自于所谓革命理想主义的驱使，但不可否认，内心深处有损人利己的卑鄙心理作祟。我在文中涉及他人绝无恶意，只是想表明像我这类的人不在少数，是差不多几代人，在禁锢自由思想与辱没独立人格的极权制度下，为出人头地做出的另一种恶性表演。

知耻近乎勇！写出我的痛悔，是为了重塑自己的人格。

“文革”岁月知青生活，帮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底层生活的真实景象，为后来的艺术创作积累了丰硕的灵感与素材。但不可拿我等所谓“成功人士”为例来肯定上山下乡运动，没有“文化革命”的浩劫、没有知青运动的灾难，必然会产生更多的人才！这场灾难埋没了上千万知青的青春年华，剥夺了他们上学深造的权利。好比地震之后幸存者治愈伤痛，努力再造家园，我们应光大这些人的顽强意志，但不可对地震予以歌颂与感恩。我不明白，为何有些老红卫兵、知青朋友至今还会自觉不自觉地颂扬这场浩劫与灾难。我们反感日本极右派老兵至今在靖国神社前高唱军国主义战歌、祭拜战犯，反感他们无视侵略战争曾给中国、亚洲、太平洋地区带来生灵涂炭的反人类罪孽，然而面对自己国人的执迷不悟，听到有人至今还会在怀旧集会上高唱个人崇拜意识甚浓的老歌，呼喊“青春无悔”的口号，借以否定自我在“文革”浩劫中炮灰角色的定位，拼死要肯定自己青年时代的“革命”价值，我们是否应抱有一丝警觉？我们刻意闪避反思“文革”，掩盖“文革”浩劫的反人类罪孽，难道不怕被邻国取笑，被后人反感吗？记忆有助于梳理自身的心路历程，反思可为后人留下经验与告诫。一个民族不敢正视曾经黑暗的历史片断，是不会真正崛起的。德国是我们的榜样，日本是我们的教训！

□ 来源：《我们忏悔》

~~~~~

#### 【往事非烟】

在毛泽东逝世的日子

• 钱文军 •

我与宙宙是在一个公社插队时交的朋友，亲如兄弟。宙宙的爸爸是留学过美国的总工程师，老伯的亲人在国共两党都是高官，他父亲是老同盟会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同蒋介石排在同一档。49年他坚决与老爹划清界限，留在大陆建设新中国。而他的岳父一家，几乎都是中共地下党。当年宙宙大姨的婚礼，延安的头头们全都参加了，包括毛泽东本人。我还见过宙宙小时候，在中南海里朱德抱着他的照片，那时宙宙还跟着他大姨。只是好景不常，他的大姨夫在高饶事件时被株连了。我知道宙宙的弟弟参军时，就是老伯找肖华上将关照的，否则绝对没门。



后来宙宙招工回郑州，要求我一定常到他家，于是我们一直往来着。我在农村并不安分，那每个工一角多一点的回报，我没放在眼里。靠着修手表、收音机，做木工、油漆，挣钱生活。捎带着搞些投机倒把，收入不比上班的少。每年还有几个月，专事读书。每次到郑州，住在宙宙家，他爹都很高兴，住在他家如同自己家。我跟老伯围棋实力相当，成了忘年棋友。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宙宙的表弟四毛从北京来避难，四毛是独生子，爹妈都是军队的师级干部，在北京三总部工作。我正在郑州给人做家具。8月上旬，干完一批活之后，决定出游一次。于是四毛就跟着我跑到苏、杭。9月初我们上了黄山玩了几天，那时的黄山，远不象后来那样人满为患的。从黄山北海宾馆下来那天，我们决定经松谷庵走到太平县，然后坐汽车由贵池上船。到松谷庵的路上，瓢泼大雨把我俩淋个透，好不容易进到庵里，原来竟是个空无一人的废庵。农民们用做炒茶叶的地方了。躲雨时见白墙上涂写了不少诗文，当然大多属涂鸦之类。于是兴起，涂诗一首：“禅佛禅到松谷庵，烟灭佛亡庵也残；山雨无情淋已透，阴霾不散走亦难。听涛门内听流喘，叠嶂峰前叠饥寒；自信浮云难蔽日，且燃篝火待衣干。”爬高些，用柴碳写在墙上。

我们于8日从贵池上了轮船，到武汉去。船很大，叫“东方红十三号”（或九号，因几天前我们从南京过来时也是坐船，哪艘是九号或十三号记不太准。）。

船的每个座舱中间是一条通道，连着船的两弦。通道两边都是床，上下铺。我们的铺位旁边，是几位穿着灰不溜秋的海军服的军官。那时没有军衔，从年龄和言谈举止看，大约都是营、团级的。上船后就见他们在打扑克，说说笑笑的。我们的舱位在三层，上一层便是餐厅。伙食决不是今天可以想象的，最便宜的份饭只收两角钱，还不要粮票。

在船舷的走廊上看了两岸的风景，我不由得有些感叹：这么大一条长江，居然没有见几艘船。显得空荡荡的。江风很大，吹得人受不了。就回舱里。几位军官依旧在打牌。我躺在床上，拿了本书看。四毛与军人有一种亲近感，于是看他们打牌，不时还参与进去，建议打这打那。没多久就混得很熟。其他的旅客聊天，基本上在说地震，唐山地震之后，似乎全国都在闹地震。

次日下午3点多，船到九江。要停40分钟。这时广播里不停地广播通知，说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有重要广播，请到时注意收听。我们都开始议论会广播什么。有一位军官说，可能两报一刊要发表批判文章。另一位马上顶过去：“还批判谁？死的死了，倒的倒了，没有批判对象了。”一位旅客接上：“宋江批过了，那就批判曹操吧。曹操也是篡党夺权的。”大家都笑起来。但批判文章不可能先预告的，有个旅客说：“不会又死了谁吧？”军官接着说：“能是谁？刘伯承？不应该有这么大动静。叶剑英？”马上有人接茬：“不可能，他躲在颐和园下棋，不会这么隆重。”一位旅客问：“你怎么知道他在哪下棋？”那人说：“我们那有一个当兵的，给叶老帅当警卫。他探亲回来说，叶帅受江青他们的气，毛主席又护着江青。他就跑到颐和园躲起来，平时跟参谋们下棋。输给他就骂你脓包；赢了他就骂你狂妄。心情糟糕得很。”这位问话的说：“等老人家千古了，把这帮家伙狠狠地收拾掉！”我说：“一小会播一次，会是毛主席吗？”上铺一个声音：“我猜是，不敢说。”年纪最大的那军官说：“别乱说。万一不是的，那就自找麻烦。”

那个年代，说话最自由的地方就是火车、汽车、轮船上。发发牢骚，讲一些“政治谣言”，发泄一下心中的闷气。反正船到码头车到站，各走各的，谁也不认识谁，不担心被揭发。恰恰是在素不相识的旅客间，往往引起共鸣，而那些“政治谣言”，多数是针对江青一伙的。人人皆知毛就是他们这一伙的后台。这两年又是水灾又是地震，蒋介石、康生、周恩

来、朱德都死了，老百姓传说老天爷发难，该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人民对没完没了的运动，早就怨声载道；只是如果这些怨言牵连到毛主席，并且被揭发，那就会倒大霉。轻则判重刑，重则杀头，还要株连亲友。现在说到毛主席，毕竟还有些害怕。所以这军官一开口，就立马没人再说什么了。

船不一会儿靠上了码头，我和四毛上九江市走了一段，时间有限，没敢走太远。回到船上，接着听到广播，真的是毛主席死了。人人熟悉的哀乐又一次响起。然后再播一次。又一次哀乐，反复几次。几位军官还是打牌。船开了，下一个码头就是终点武汉，我还在看书。不久广播了停止一切文化娱乐活动七天的通知，又广播了18日开追悼会的决定。一个军官说：“还打不打？”那位年长的军官说：“管他呢，打完这把再说。”

过了一阵，船上的广播宣布：为了哀悼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有旅客排队到四层餐厅，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告别。由船上工作人员带领，请大家按照顺序，听从指挥。军官们的扑克也停下来了。不久，就看见门外排队，由右边弦廊上餐厅，告别完了从左边弦廊下来。四毛问我：“老大，我们去不去？”我答：“去个屁。”“会不会有麻烦？”“别让人知道就不会。”

谁知我们这个舱好些人都不动。有一个船员进来：“你们怎么还不动？快些。”那边有一位说：“我不舒服，晕船，可以请假吧？”那船员说：“你们证明，我来喊过你们了。”就走出去了。门外的队伍慢慢移动，看不出这船上有那么多人。我听见一个军官问：“这边是回来的吧？”另一个旅客说是的。几个军官立即从左边门出去，加入了告别过回来的队伍里。我立即对四毛说：“走，跟上。”于是我们也从左边出门。后边还有几个旅客也跟着。我们俩在后甲板一角看了会风景，四毛说，这几个军官也不去告别，真没想到。我问四毛：“你爹妈他们发不发牢骚？”他说，也发一点儿。主要是对江青，忒讨厌她。“我妈还骂过她是婊子。你可不能说出去。”另外就是说过，三支两军把部队搞乱了，威信也搞糟了。我问：“不发毛主席的牢骚吧？”四毛说：“那他们不敢。不过谁知道，关起门来也许会。”闲扯一会，回舱。

等大家都回到舱里，七嘴八舌说话。我听清楚他们介绍告别式的场面：毛主席相围上了黑纱，一小堆白纸花，进去每人发一朵，三鞠躬完出门又收回来。拿去发给后边进来的。有位军官小声说：“形式主义。”四毛问：“老大，你说毛主席死了，会不会变天？”我笑了，说：“别做梦了，换药不换汤。就这么回事。不过日子应该会好一点。”旁边一位旅客听见，笑起来：“有意思，挺有意思，换药不换汤。”奇怪的是，直到武汉，船舱里却没有再议论毛主席死后的任何事情。反倒是有一种不甚明白的情绪，大家都等着看。

船到汉口江汉关码头已近中午时分。我们上了岸，我口袋里只有一角钱了。加上不知道该坐几路公共汽车。于是我建议，走吧！反正沿着江汉路走，能到我同学的厂里，那厂在江汉路的另一头，新华路，我带路。肚子很饿，路特别长。总算走到了。于修、猿猴两个见到我，高兴地大叫。我们是同学，他们回原籍下乡后，70年就招工了。一说还没吃饭就马上到饭堂去，幸好还有饭卖。还给加了个菜。我们俩狼吞虎咽，每人吃了六两大米饭。还聊了一通路上的见闻。四毛说，他下午就要回郑州，问有火车没有。我笑道，没来过武汉，玩一两天再走不行？他说，出来太久了，怕爹妈惦记。又问到哪去买票。于修大叫起来：“买什么票，扒上车就走。到郑州几个钟头，怕什么？”猿猴又说：“老大从来不买票，人都是国家的，算出差。”四毛说不敢。我说，借十块钱吧，我们身上都没钱了。谁知四毛说不用，他还藏着十块钱，够了。我笑着大骂他搞阴谋诡计；他倒老实，解释说怕我花光了，留十块应急的。

送走四毛后，我们三个到了于修家， he 现在是厂里的汽车队长，管三辆汽车，属于一等公民。买了点菜又来了两个好朋友，买几瓶啤酒，聚了一餐。席间，猿猴说：老头子死了，你也该招工了吧？我说现在我不想招工了，一个月三、四十块就把自己给卖了，划不来。那位当老师的朋友说：“毛老头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叫学生下乡。全国各地这些小伢儿，千把万人，都给贫下中农教坏了。一讲就是59年60年，饿死几多人。那叫忆苦思甜嘛？明明就是忆甜思苦！我插队那个地方，农民讲地主还比公社干部好。解放前有点灾，地主还晓得减租。59年饿死人这些干部还要各家各户搜查粮食。几狠心哟。”我告诉他，我插队那个公社书记说：“是政府养不活你们，才叫你们下乡的。让我们养，我们也不想养。”大家哄堂大笑，说这个书记还不错，至少讲点真话。共产党的干部，自彭德怀被打倒，没人敢讲真话了。林彪总结的，“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可算经验之谈。

接着大伙议论天安门事件会不会平反。我估计至少两三年内不可能，但总有一天要平反的。于修同意，说全国至少几十万人，不平反才怪。那位朋友认为，反右派也有几十万，还不是没有平反。于修说，现在老头子没有了，没人压得住阵，情况不一样。古时候新皇帝登基，都要搞大赦的，你怕华国锋不搞？不搞他哪里坐得住？接着谈到会不会打内战的问题。都有点担心，军队那帮老将，早就恨死江青了，弄不好真会打起来。

反正，毛泽东的死，远不如周恩来死时那么令人悲痛。那时，全国各地都自发地搞了一些悼念活动，老百姓出自内心的怀念，用各种行动来表达哀思。连毛泽东也知道，这种哀思其实包含着更多对他的施政方针的不满。尤其是在镇压了“4·5天安门事件”之后，那份总理遗嘱弄得全国都沸沸扬扬。现在却没有这种举动，一切活动都是官方安排的。周恩来去世时，我也到了武汉，街头看到，每辆公共汽车车头、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挂满黑纱、白花，现在却没见到。人们依旧盘算着过日子，并听天由命地等着看政局会怎样。报纸上、电视里、广播电台都是连篇累牍地宣传那些怀念毛主席的文章。猿猴说，现在的报纸，只有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次日晚上，于修开车，我们到了汉阳他的一位朋友家。那里聚着五六个人了，都是下乡的人。于修介绍说我还在农村插队，大家便有了些同情话。接着那位朋友拿了床毛毯把窗户给遮住，于修喊热，那位说：“巴妈儿的，现在还是停止娱乐活动的，防到些好。”原来这几位都是吉他爱好者，请来一位高手，想学一两手。于是开始弹吉他，间或，也跟着唱。那位确实是高手，吉他弹得棒极了，引得同院的邻居也到门外听。特别是弹到那首：“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参加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已经到来，我们的战斗生活象诗篇。”因为都看过那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竟成了合唱。

院子的门有人敲打，所有人都不出声了。屋主出去开门，原来是居委会的。我听见那妇人说：“现在是非常时候，你们要乐就小声点。小人总还是有的，跑跑去告一下，搞出些麻烦就不好了。”屋主陪了些好话，进来关了门，解嘲似的说：“一得意，就忘了形了。注意点。我那个窗子，对到巷子的，挡起也挡不严，外头听到了。”又弹了几首曲子，终不象原先那么无忧，干脆散了。

次日，我习惯性地扒车回到郑州。宙宙上班地点离火车站不远，先到那，他给了家里的钥匙。等他下班回家，进门就说：“你可回来了。四毛回北京了，这几个哥们老问我，老大啥时回来，这不是老毛死了个逮的，大伙想唠唠。”没等我开口，他又说：“我跟你讲，最近在这可是出了好几个反标。都是为邓小平、还有天安门事件翻案的。有一个标语挺有意思：‘批邓很不得人心！’”我问：“抓到写标语的了？”“不知道。可能还没有，今天早上单位上还叫大家注意，阶级敌人乘毛主席去世会跳出来，大家要检举可疑线索。谁会去干

那缺德事，我师傅说，谁检举，谁生儿子没屁眼儿。”我问：“你爹呢？”“他出差好几天了，明天也许回来。”

晚饭后，我们俩骑车到了二·七大道，到设计院许工程师家。这位许工我也挺熟，夫妻俩都是60年印尼排华时回国的华侨，爱好养鱼。原先为热带鱼过冬头疼，我给出了个主意，把电烙铁芯子放进试管，用环氧树脂封口。扔进水里插电，解决问题。两口子高兴坏了。谈了一会鱼的事，许工说，他们夫妻俩现在正办着回侨居地的手续。回印尼很难，但在马来西亚的亲戚已搞好了进入马来西亚的必要手续，如顺利，年底前就成行。我问，外边的日子是否比国内强？许工说，我们都不关心国内政治，老朋友面前就实说，太恐怖了。你想，国家主席都可以整成那样，普通人又如何保证？没有这种保证，法律的保证，任何人都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了。人不是蚂蚁，不是说饿不死就心满意足的。后半生不想在这种毫无自由可言的环境下度过，还是出去好。

他又说，我们都是回国后上的大学，也为国家做了十多年贡献，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良心。他苦笑着说：“当年回国，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时就可以去马来西亚，不肯去。现在却费尽力气过去，真是一言难尽。”说着也就自然地转入毛去世后的事情上去了。我认为，毛去世后这种局面会缓解一些。他问理由何在？我答，很简单，没人可以具备毛的威望，也就不能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民应有的权利。即使是毛泽东本人，天安门事件就说明人民已经开始反抗。许工夫人慌忙打岔，说：“老大，好了，别再讨论下去了，惹出麻烦来我们的力气就全白费了。”这时我注意到，她在我们来到后就把黑白电视机调大了音量。许工解嘲说，很对不起，我爱人现在胆子很小，吓怕了，生怕大祸临头。我很愿意和你们讨论这些问题，人嘛，总不能没有思想，但现在却不能。这也是我们决心离开的主要原因。聊了会，我们告辞。

第二天焦老伯回来，他57年险些成右派，以后就不谈国事了。他除了与我谈论围棋之外，至多偶尔谈一些30年代在美国读书的事。这次，打开收音机之后，摆好棋盘，低声问我，毛之后中国会怎样？然后投子。我笑起来：“焦伯伯，这么多年您第一次谈政治。”他道：四毛回来说，你讲“换药不换汤”，我感觉这话里面有文章。我反问，您觉得华国锋能坐多久？他道，当然是他当头，毛主席定的嘛！我说，那得看他的能耐，从宣传上看，毛只是为了平衡，强拉他的。如果江青把他拉过去，中国就打内战。如果拉不过去，叶剑英这批老将，手中有军队，他也许会成代言人。你看他这几天讲话，最怕邓小平出山，一个劲的继续批邓。不管谁上台，都会维护共产党的江山，否则他自己的权力就不存在了。不可能有大变化，这就是换药不换汤。至多不搞运动了，因为除了毛主席本人，没人具有把运动搞下去的威望。他说，只要没有运动了，那就好。这种运动，千万不要再搞了。于是下棋。

在郑州的几天里，原来一块插队的朋友们陆续见过。他们招工以后，基本上忙于恋爱结婚，有的生了孩子，属于混日子之类了。毛泽东的死，似乎吊起一些关心政治的念头。因为这毕竟关系到他们未来生活会如何。我发现，没有哪个感到什么悲痛，反倒都觉得解脱。插友们告诉我，单位上都通知了，追悼会那天不许请假，也不准迟到。还不能穿黑、白色以外的任何衣服。女同志不许穿裙子。等等。毛二不知听到什么消息说，不用再下乡插队了。他感叹道：“嘿，他要是早走七八年多好，咱也不用下乡了。”这个人群都是狂热的“毛主席的红卫兵”。看来武汉那位仁兄说的，“都给贫下中农教坏了”，有点道理。只是，这个“坏”当另行理解。

还说到一个小道消息：许世友在人大会堂告别遗体时遇到江青，告诉她，毛主席在世我让你三分；毛主席不在了我决不会让你了！这传说很让人解气，老百姓确实恨死江青了，周恩来死时，她不脱帽子，电视机前就有不少人骂出声来。须知，那时看电视还是集体行动，

即使谁家有电视，左邻右舍都聚集来看的。还传说她与唐纳的种种流言，以及周总理下令全部买回她与美国记者的谈话记录那本书。关于电影《创业》、《园丁之歌》，江青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人们听说后都要互相转告，高兴得很。唯一不解的是：既然毛批评她如此之多，何以她却不会降反升？别人是只消毛半点批评，马上垮台！一句话，用怨声载道来形容毛去世前后的民意，是决不夸张的。

郑州火车站旁正兴街一座新建好的过铁路地下通道，原定的通车典礼因毛逝世推延，17日夜，有人在新修的柏油路面上刷了大标语：“批邓不得人心！”18日上午我和宙宙骑车前往，只见围观不少人，标语早就用锯末盖上了，现场被封锁。据说那些刷标语的是开着汽车来的，且没有逃走，坐等被抓。我们看看就走了。那条“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大标语则比比皆是。官样文章依旧充斥报纸电台，调子唱得很高，却完全没有百里长街送总理那种发自内心的悲伤。追悼大会可谓哀荣备至，也明摆着是一种形式；主席台上一副副貌合神离的面孔，象是一幕滑稽剧。

第二天，我回乡下，是读书和想问题的时间了。在信阳转汽车时，也见到了一批招工在信阳的插友。同样是“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一朝天子驾崩了，又一朝天子登了基。人们没理由不抱一线希望，希望新天子能比旧天子强些。可大老郭那席话却使人高兴不起来：“你看华国锋那眼，跟奸臣似的，没一点帝王相。这能行？”他居然会相面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继续批邓，还要把文革进行到底，这些都不是老百姓所期望的。

回到乡下，农民们是不谈什么政治的。说的就是：怨不着水灾、地震，原来这些个大人物都要归天。大队部的干部们还不时扯扯。这天，我正在大队部，同几个大队干部闲聊。在公社广播站干活的崔会友风风火火闯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北京抓住了四条大混子，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全抓起来了！华主席厉害，真厉害！能得很啊！”“真的？”几个人齐声问道。落实了以后，刘文才会会计一拳砸在桌子上：“你妈也，好！老黄！到围沟里打几条鱼，今晚喝两盅！”我确实没想到，这些农村干部也会如此激动。老黄笑刘文才：“你不是说华国锋是阿斗么？这回咋样？”刘文才耍赖：“俺没说过。你造谣！”笑呵呵的。

酒到半酣，我问这位部队复员回来的会计：有多少年没有这么开心了？他想了一会，说从参军那次起。而大队民兵营长说，从成立互助组开始，就没有开心过。“说是斗地主分田地，你妈耶，庄稼还没收两茬，就搞互助组把田给收了。再就是合作社、高级社、公社，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及一年。这叫啥日子？俺们这些当干部的，耍好强些。老社员那日子，还不抵旧社会。打食堂关到现在，就没吃过饱饭！”这营长算我的本家姐夫，抗美援朝复员回来，本来分配到铁路上，可他坚决要回家。我笑他，你要到铁路不就没事了吗？他急得叫起来：“俺们这，老祖辈起，吃不完用不完。比城里还强些。自打这公社一搞起来，全都挪熊！‘食堂关’俺差一点饿死。不是俺战友从信阳给俺寄了二十斤粮票，俺家里少说死一半人！在朝鲜俺救过他一命，瞧着这情况他觉着不妙，主动寄的。高头还把俺查了一通，说俺乱写信，干部职务也免掉了。末了‘搬石头’才恢复的。不信你问他几个。”大伙全都证实这事。酒壮人胆，接下去就成了诉苦会，全是那年饿死人的故事，崔会友更是哭成泪人一个。弄不清喝到几点，几个人全在大队部睡了。

一个时代，到此就结束了。

□ 来源：《猫言无忌》，2003年5月

~~~~~

【当事者言】

## 清华大学武斗的结束（下）

• 陈育延 •

（上接 z k 1 8 1 2 c）

（四）谢富治努力弥合清华井冈山与工宣队的矛盾，我代表团派总部与工宣队进行了一周的谈判

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召见后，当天下午和晚上，按谢付总理的要求，我们动员北航的清华同学回校。团派总部本身就产生了三种意见：第一派意见是鲍长康、王良生和我（陈育延）为代表主张回校。理由是：毛主席召见蒯大富，本身就是对团派的支持。中央文革表态和谢付总理的讲话，也都很明确地支持清华井冈山。我们应当配合中央，回校和工宣队搞好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左派组织。第二派意见是大多数，他们不敢回校，因为工人宣传队反团派的情绪很大，基本上是见团派就打，他们害怕被抓，被打。第三派意见是以任传仲为首的少数几人，他们坚决要人回校“坚守岗位”，不是和工人搞好关系，而是要与工宣队“继续战斗”。这批人是27号晚就不同意撤走而支援9003楼的。尽管这样，经过我们动员，北航还是有一些清华同学回到了学校。

7月29号，为了让被困在9003楼的团派战士能安全撤出，我代表总部去和工宣队谈判。我们同意交枪，拆工事，但要求我们的战士安全撤出。结果是：我先作团派的思想工作，团派很多战士当时想不通，只能被迫交枪。再与工宣队谈，工宣队一定要我同意四项条件才肯放人，工人将我团团围住，不准我再与9003楼的团派接触，也不让我走，要我答应他们的四项条件，结果我在9003楼外围被扣了11个小时，从中午1：30开始，一直到夜里12：30，都未达成协议。细节如日记中所记：“他们既不让我去9003工厂，又不让我回兵团总部。他们偏要我同意四项条件：1）立即上交所有武器。2）立即拆除所有工事。3）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向革命职工低头认罪，写检讨。4）办学习班，由宣传队负责。并说，在保证这四条的情况下，我们工人保证9003战士安全撤出。我当时只同意了前两条，我说：必须在保证我9003工厂全体战士安全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做到，第一，上交全部武器。第二，立即拆除工事。第三，写检讨。最后，谈判不成功，我于12：30到1：00被送回明斋。”（摘自1968年7月31日日记）

明斋是团派广播台和井冈山报的所在地，我临时住在那里。我当时不同意后两条，是因为我只承认我们犯了错误，可以写检讨，但不是犯罪，所以不应“低头认罪”。而第四条“办学习班”，我还想以团派为主导，不同意“由宣传队负责”。因此，第二天签协议，市革委领导主持，这两条回避了。

两个小时后，从7月30号凌晨2：00开始，市革委会付主任吴德，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和副政委刘绍文主持召开井冈山兵团总部与宣传队负责人的谈判会议，达成协议，开始放人。我现在还留有宣传队拟就的谈判协议的草稿原件，是用铅笔字写在稿纸背面的，这个协议可能是迟群拟的稿，“30日”是按“卅”来写的。但在协议上签字的不是他，他是幕后的指导。时间是1968年7月30号早8点半。宣传队措词严厉，因为在9003楼团派打死了工人。现抄录协议草稿原文如下：

◇ 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红代会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协议

红代会清华井冈山热烈欢迎、完全支持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清华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七·三布告的革命行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七·二八最新指示的光辉照耀下，在市革委会领导下，在解放军同志指导帮助下，达成协议如下：

一、立即无条件贯彻执行七·三布告，停止武斗。

二、立即无条件地交出所有武斗凶器，包括校内外，一件不准打埋伏。今天下午四时以前交清校内武器。

三、立即无条件彻底的拆除所有武斗工事，立即撤出武斗地区。

四、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组织学习毛主席批发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毛主席“七·二八”最新指示，彻底清理阶级队伍。

五、立即恢复水、电、电话。

六、此协议签字后立即生效，由北京卫戍区刘绍文同志并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监督执行。

北京卫戍区代表 刘绍文

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代表 王慎、柳一安、郑清海、董太和、李保杰、施镜清、张世忠、金满银、刘风、刘桂芝、任庆君、胡墨林。

红代会清华井冈山总部代表鲍长康、刘才堂、任传仲、陈育延、左正平、崔兆喜、黄跃寰、王庭佛、高季洪、周大卫。

一九六八·七·卅·八点卅分

一直到早晨8点半，也就是此协议签订后，9003大楼才开始放人的。细节也如日记中所记，“我当时坚持要9003工厂的全部井冈山战士在交武器的同时撤出，结果是卫戍区刘绍文帮助解决了。9003的井冈山战士在撤出时，受到了最大的人身侮辱——搜身，并且不许打井冈山红旗。他们很多人都是哭着出来的。一到明斋，就开会，痛哭，然后跟游行队伍离开了清华。这天，井冈山战士心情沉重，情绪极大。但是，他们哪里知道，此时工人已牺牲5人，伤六、七百人了。晚饭时，蒯、鲍、我讨论，他们要离开清华，我不愿意离开，我认为现在离开是错误的，还应当再看看。”

7月30日晚上，团派在北航召开总部会。在这个会上，团派情绪很大，有人提出继续在工宣队里“抓黑手”。蒯大富同意并作了布置。这时候蒯大富、鲍长康的心情就如9003大楼撤出的井冈山战士一样，觉得很受侮辱，很受打击，所以不想回清华，让我留下处理清华事务。

7月30日，校内井冈山战士第二次跑光，工宣队无法顺利收缴全部武器。我只能将已收缴到的武器清点签字。因此，7月31日北京市卫戍区的军代表刘丰、海军宣传队领导、工人宣传队领导都来北航劝我们回校。下午，市领导吴德、刘绍文又轮番来北航劝说我们回校。晚上谢富治亲自来，先到清华找工宣队谈，对工宣队下达了七条指示和三条口头指示；又到北航和我们谈，让清华井冈山战士回校，并在北航礼堂讲了话。谢富治讲话中首先肯定了我们，他说：“清华井冈山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紧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还有他们那些小爬虫王关戚作斗争，你们作了很大贡献。……特别是你们反对刘少奇，和他的特务老婆王光美作斗争，你们是有功劳的，你们是有功勋的，你们是干得对的！”（底下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井冈山人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周总理！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接着高度评价了：“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完全正义的行动。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是符合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说我们反工宣队是“小将犯错误，这个错误是严重的”并说“这个错误要是我犯啊，那就立即撤职，你们犯了不要紧，但是要改正噢，不能

够屡教不改噢。要作检讨，要支持工宣队，要刷大标语欢迎支持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说“当然，首都宣传队没跟你们商量，这个人啊，多了一点。现在他们这个任务哇，制止武斗的任务哇，已经基本完成了。他们自己主动提出减少三分之二，这个具体事情跟你们领导小组都谈了。”（摘自当时的油印记录稿）谢富治要求“清华同学统统回清华，正常搞四大，不要武斗。”“对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理解的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随后，让随同来的军宣队负责人也讲了话，表达了“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红卫兵小将的深厚战斗友谊”。这条讯息登在了1968年7月31号的《井冈山报》第154期上。

清华井冈山从成立开始，谢富治一直支持蒯大富，特别是414分裂以后，从来表态都是在井冈山兵团一边。7·27这天蒯大富出了这样大一个纰漏，谢富治仍然想尽力帮助他。

由于在7·27，团派与414对工宣队完全不同的态度，因此在7·27过后的几天中，与工宣队的和解谈判主要是在团派与工宣队之间进行。谢富治为了缓和工宣队与团派的对立情绪，出面斡旋。要工宣队顾全大局，让他们摆摆红卫兵小将在文化革命中的“丰功伟绩”。工宣队因为死伤众多，情绪很大，一个工宣队头头气愤地说：“摆什么摆！要摆就把我们受伤的那些工人在操场上摆起来！……”

当我们与工宣队的谈判卡壳时，谢富治就叫市革委的刘绍文来处理。实际也压着工宣队放人。最初的工宣队，还没有后来那样神气。曾经有一次，我亲眼看到谢富治叫迟群出来签字，迟群只好满脸通红、很不情愿地从后面站了出来。所以后来蒯大富说：“我和谢富治特哥们儿”，一点也不假。在7·27打死、打伤工人的情况下，仍压着工宣队，不让他们再整团派这批“革命小将”了。“谢副总理来后（工宣队）就不敢打学生了。”谢富治让工宣队“把押在各厂的清华学生放掉。”（摘自7月31日的工作记录）而在这之前，工宣队是见清华团派就打。7月31日，谢富治对宣传队的七条指示和三条口头指示，都明显偏向团派，这在我存留的文件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内容如下：

◇ 谢副总理7月31日七条指示：

- 一、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人数减到五千人。
  - 二、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住在清华井冈山和414之间宣传毛泽东思想。
  - 三、暂时分门分区维持秩序，学校五个门，宣传队负责南门；清华井冈山负责北门、西门、西南门；414负责东门。
  - 四、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在校内恢复一切正常活动，在目前两派对立情绪没有消失之前，主要在自己的区域内活动。  
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住：焊接馆、汽车楼、动农馆、招待所、附小、幼儿园等地；  
414住：主楼；  
清华井冈山住：原东区全部、原西区全部、原礼堂区全部；  
由解放军保护9003工厂。
  - 五、武器上交不要太急，要通过政治思想工作，作到自觉上交。
  - 六、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欢迎校外同学回校。对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如有意见欢迎批评。
  - 七、爱护革命小将，爱护清华一草一木，不拿一针一线，作到秋毫无犯。
- 1968年8月2日

◇ 谢副总理口头指示：



- 1、所有抓的人都要放，4 1 4 抓井冈山的所有人员都要放，统统放。
- 2、清华的所有财物都要归还，包括国家的和个人的。
- 3、宣传队负责处理工资和助学金问题。

此文件大致内容也登在1968年7月31号的《井冈山报》154期上，但没有说明是谢富治的指示。从文件上，可看出7·27过后最初的一段时间，工宣队并未掌握清华领导权，而且有很大的“临时性”，由三万人降成五千人。因此两派都不会认真交武器，怕工宣队走后又打起来。团派虽然对抗工宣队是犯了大错，但在清华的活动区域上仍是“老大”，当时清华的中心区是礼堂区，全部由清华井冈山（团派）住。除此而外，东区全部、西区全部也归团派管理，学校五个门团派管三个，4 1 4被挤压到东门和主楼。谢富治显然是在偏袒蒯大富和团派。其实，他本人与蒯大富并没有很深的个人交情，更何况在社会上刮起“倒谢风潮”时，蒯大富照样也动摇和投机。谢富治的表态实际上是显示了中央文革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也有毛主席的影响因素在内。毛主席一直是偏向清华井冈山（团派）的，谢富治充分领会了这一点。

7月31号谢富治的北航讲话和七条指示下达后，团派受到了安慰，滞留北航的井冈山战士开始返回清华园了。从“7·27”历时4天，到7月31日团派才最终同意了全部上缴武器。因此可以说，团派7·27武力对抗工宣队的事件，到7月31号告一段落。但此时，团鹰派的对立情绪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弱。

这时候，我也很清楚，看到工宣队与团派的对立，4 1 4正“偷着乐”，我不想让4 1 4捞到稻草，因此也希望和工宣队缓和。鉴于来自上面“要保护红卫兵小将”的压力，工宣队暂时停止了对7·27肇事者的追究；而我，由于早就是一个希望停止武斗的人，所以不久就改变了态度，愿意与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合作，解决清华大联合问题。毕竟他们是毛主席、中央文革支持的，我又一贯是追随“党的领导”的，决不会背离党的旨行事。而团派很多人，特别是“鹰派”的头头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能改变对工宣队的抵触情绪。团派内部严重分化了。我在后面的日记中，都有详细的叙述。

团派的报纸和宣传虽然都是欢迎支持工宣队，但有不少人还是想把工宣队“挤出去”。后来，在很多事情上不与工宣队配合，以至8月4日下午，谢副总理不得不专门指示：“工农宣传队要住哪个房子就住哪个房子，礼堂空出来，由工农宣传队掌管，今天就办。”（摘自1968年8月4日工作笔记），而在此之前，礼堂区由清华井冈山（团派）住，不肯腾给工宣队。直到1968年8月5日毛主席送芒果给清华宣传队，为工宣队撑腰，团派才开始软下来。

从1968年7月29日到8月4日这一个星期中，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谢富治、吴德、黄作珍、刘绍文、刘丰等轮番出面，召集清华井冈山兵团（团派）与工宣队负责人谈判。蒯大富除了在7月28日与迟群等人签过协议，后面的谈判都不再出面了。团派总部轮流签名的人不少，但固定的主要出面和落实协议的人是我。

7·27过后的第五天，1968年7月31日，我在忙碌中又断断续续写了一些日记，记录了一些与工宣队谈判的过程。这个日记写了四天，因为是私人日记，因此多是从个人角度来记录，但仍可看到我们当时的真实思想状态。我将原日记抄录如下：

◇ 日记1968年7月31日——8月4日

从7·27到现在已经五天了。这五天惊心动魄的斗争如果不记载下来，那简直是太可惜了。

7·27那天上午，我正在静斋，忽然有几万“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我校宣传《七三布告》。在这之前两天，即7·25，7·26两天，也有大批人到我校宣传《七三布告》，制止武斗。我们清华井冈山都还是支持的。唯有这天，进清华后就拆工事，围楼。再加上团派许多人，包括许多头头在内，对主席《七三布告》不十分理解，因此发生了冲突。我战士一百余人被抓被打，同时清华井冈山战士用手枪，手榴弹炸伤工人100余人，死两人。当天，蒯大富向市革委会汇报。下午与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达成四点协议。当晚，为了防止与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再发生大规模冲突，我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会议，决定全部撤出清华园。一夜之间，井冈山战士几乎全部跑光。真如人说的：“1000余井冈山人钻地道跑了，忽然没了。”可笑！哪里有什么地道。

7·28清晨4：00，我离开清华。我同蒯大富、张树友、段永基乘坐卧车到电报大楼去给中央发加急电报。6点多，我们到了北航，在北航，我们听到了中央接见蒯大富的通知，蒯、张、段前往，我留北航睡觉。

当天下午，听到了毛主席清晨3：30到8：30接见蒯、聂、韩、谭、王的消息。韩爱晶给撤居北航的我兵团战士传达了部分主席指示。传达后，韩爱晶发现我站在后面，就对我说：“江青同志两次提到你，说陈育延要保护。”晚上蒯大富回来，又讲到：“主席对我们学校情况特别特别了解，主席说你们总部的鲍长康、刘才堂、陈继芳、陈育延、任传仲、马小庄要经常在一起讨论。江青同志问：陈育延怎么样了？蒯大富说陈育延被414抓了，饿了六天六夜，快死了，才放出来。江青同志讲：陈育延是个女孩子，要保护她。”这件事情在北航很多人知道，在我校引起了反响。有人说：“保护陈育延，是因为她是个女孩子。”有人说：“保护陈育延是因为她被414抓过。”但只有我心里明白：保护我，实际上就是保护我的观点。因为我的观点在团派内部是遭到反对的、排挤的。从去年五月卅日到今年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经常地受到排挤而逍遥。我至今，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比较符合主席思想的。正像韩爱晶和蒯大富传达的主席指示：“414太右了，蒯大富偏左。”我实质上就是这样的观点。我相信，坚持自己的观点最后总是会胜利的。不应当怕遭反对和围攻。过去太软，对414和对团派都太软了，这样就无法组织群众，说服群众和发动群众。今后，还要恢复到写大字报，大会发言，组织群众这方面来。要多读下列几种书：毛选四卷、学习资料、鲁迅全集、唐诗，这样对于坚定观点，增益知识，心情舒畅是大有好处的。

7·28当天下午、晚上，我们动员北航的清华同学回校，产生了两种意见，以鲍（长康）、陈（育延）、王（良生）等为首的，坚决主张回校。当时我们的意见是：主席接见，中央表态，谢副总理讲话，非常明确地支持清华井冈山。但最后改变校内形势，变坏事为好事，还是要靠自己努力与中央表态要紧紧配合，要回校和工农宣传队搞好关系。不能光想等中央表态解决问题，那就称不上什么“左派”组织了。但以东区某些人为首的一批人，坚决反对回校，理由是校内反团势力太强，回校后就会被抓、打，这是第二派意见。还有第三派意见，是校内“坚守岗位”的任传仲等为首，他们坚持要人回来，但决不是和工人搞好关系，而是与工人“战斗”，“坚持战斗”是他们的口号。最明显的就是9003工厂。这第三派意见的人是27号晚上就不同意撤走的，他们主张战斗下去。而我们为了避免大规模冲突，就要撤。他们就认为我们是右倾逃跑主义……当晚，北航回来了一部分清华同志。

7·29中午，我去9003工厂处理谈判问题。那天，我同意西区的宣传队拆工事，而当时许多战士是思想不通的。因此，为了缓和9003工厂的60名井冈山战士与工农宣传队的矛盾，使他们交枪、拆工事后安全撤出。我以总部代表身份去谈判，结果在9003外围被扣11小时，（从中午1：30，到夜里12：30）他们既不让我去9003工厂，又不让我回兵团总部。他们偏要我同意四项条件：1、立即上交所有武器。2、立即拆除所有工事。3、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向革命职工低头认罪，写检讨。4、办学习班，由宣

传队负责。并说，在保证这四条的情况下，我们工人保证，9003战士安全撤出。我当时只同意了前两条，我说：必须在保证我9003工厂全体战士安全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做到，第一、上交全部武器。第二、立即拆除工事。第三、写检讨。最后，谈判不成功，我于12：30到1：00被送回明斋。

从7月30日清晨2：00开始，我们在市革委会吴德、黄作珍、刘绍文等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井冈山兵团总部与宣传队负责人的谈判会议，达成四项协议。我当时坚持要9003工厂的全部井冈山战士在交武器的同时撤出，结果是卫戍区刘绍文帮助解决了。9003的井冈山战士在撤出时，受到了最大的人身侮辱——搜身，并且不许打井冈山红旗。他们很多人都是哭着出来的。一到明斋，就开会，痛哭，然后跟游行队伍离开了清华。这天，井冈山战士心情沉重，情绪极大。但是，他们哪里知道，此时工人已牺牲5人，伤六、七百人了。晚饭时，蒯、鲍、我讨论，他们要离开清华，我不愿意离开，我认为现在离开是错误的，还应当再看看。最后他们把我留下处理日常事务，他们自己走了。

这时，我仔细查看了笔记本（即：从宣传队的小头头或军代表身上搜出的笔记本），上面写了这次7·27行动的计划，怎样围楼，怎样抓人，抓坏头头。其中有蒯大富、鲍长康（包长常）、任传仲（任传中）、刘才堂（刘彩堂）、陈育延（陈一言）。同时也有414方面的，沈如槐，张雪梅，陈楚三，刘万璋。看了这些，不由得我疑惑起来，到底其中是否有坏人挑动？

同时，我也更体会到毛主席的英明和伟大，为了支持清华井冈山，就接见了蒯大富，使414捞不到稻草。为了使首都100万工人支持清华井冈山，使双方感情不对立，缓和下来，又严厉批评了蒯大富。这天晚上，我想了很久。

今天，7月31日，由于校内同学第二次跑光，宣传队没有了对立面，所以校内冷冷清清。我在明斋倒忙得要死。

上午10：00，刘丰来，希望总部解决思想问题回校。同时，我又清点了武器，签了字。刘丰还没走，海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来了，也希望我们回校和工人们好好谈。近中午，工农宣传队工人代表王慎（第二机床厂革委会第一付主任）也来了，希望我们回校。下午6：00左右，吴德，刘绍文来了，也要我们回校。后来谢副总理来，与工人谈，又到北航与我们谈，要回校。对工农宣传队有六点指示。因此，当夜我就回到了清华，商量第二天在大礼堂召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热烈欢迎，衷心感谢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清华宣传7·3布告，7·24布告大会”。我们和工人的情绪，就这样逐渐地缓和了下来。

在与工宣队谈判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工人有情绪，谢富治等领导在作调解。另外，我还记录了一些简要的谈话内容，也抄录如下：

#### ◇ 与北京卫戍区和工人宣传队的谈话纪要1968年7月31日

9：00收武器。

10：00刘丰来

谈话纪要：

- 1、工人说团派消极抵抗。
- 2、开放校门、楼门。（对414怎么办？开放否）
- 3、找宣传队总指挥部。
- 4、办学习班，与宣传队合办。

北灯东方红：593403（传达室），593266转五车间，找董卫国、焦润贵，四车间田清江，厂武装部长（李丰）

卫戍区派来的，当时说。现在军管会负责人让我们改口，说是自发来的。1.指挥部让我们围井冈山的楼。2.上级说灯泡厂围楼有经验。第一批造反派逐渐都走了，后来来的都是老保。武装部长说蒯检查后要上台揭发他。谢副总理来后就不敢打学生了。（是大厂，是8341部队，毛主席警卫团的。）

1968年7月31日

有家属看到五位司机，李振民说老四的广播录音是假的。

中午：2：00，宣传队王慎谈

1、希望搞一联合办公室（总部和宣传队）与总部研究一下。

2、提供线索，谁有枪，埋在哪里。

3、希望今晚把总部的召集一下，刘绍文要找。（谢副总理指示）到新水找王慎。

4、值班（明斋）。

5、把押在各厂的清华学生放掉。（外地的？转成外地？）〔摘自1968年7月31日工作笔记〕

1968年8月3日和4日，蒯大富召集团派总部委员们开过一些会，对上面的指示作了传达。在协调各方关系时，蒯大富一方面要求大家“要真心诚意欢迎宣传队，言行一致。”另一方面又向思想混乱的团派总部委员们表示：清华“有人就有井冈山，垮不了，

（有）主席保。”我在后来的反省中也曾提到：“蒯大富有一句名言：‘事实证明，凡是极力反对清华井冈山、仇恨蒯大富的，最终结果是他们自己的垮台’。”〔摘自1968年11月20日日记〕。这也是蒯大富始终不能真正收敛自己的原因，他总认为自己和清华井冈山在毛主席的保护下是一面不倒的旗帜，是不会垮台的。这两天的会议我也作了简单记录如下：

◇ 总部会1968年8月3日

一、不要再传谣。

二、不准挑拨总部内部，总部与战士，战士与工人，群众与中央的关系。

三、传达。

讨论

蒯：思想要跟上，思想方法不要片面性。要真心诚意欢迎宣传队，言行一致。

总部核心会1968年8月3日晚

一、讨论战略，大方向。

二、有人就有井冈山，垮不了，主席保。

1968年8月4日下午

一、传达谢副总理指示：工农宣传队要住哪个房子就住哪个房子。礼堂空出来，由工农宣传队掌握，今天就办。

二、工农宣传队今晚找总部开会。8：30新水利馆〔摘自1968年8月3日、4日工作笔记〕

后来，在《大联委学习班》写的《文革履历》上，我对这一周与工宣队的谈判作了简要叙述：

7·28召见后，蒯大富片面地、为我所用地传达了主席指示。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清华大多数同学都不敢回校，住在北航。总部里只有鲍长康、王良生和我主张回校。因此，蒯大富叫我和张树友留在学校，作为谈判代表，观察形势。（证明人：张树友）

7月31号上交一批武器，当时清华团派负责武器军火的是任传仲，具体收武器的也是他，工宣队方面验收的大概是金满银（南口农场工人）。但我是谈判代表，交武器的时候我要签字。所以我知道团派交武器很迟缓，这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方面怕工宣队走了再打起来，一方面参加武斗带有武器的人大部分不在学校，或在北航，或在200#（原子基地）。但我从来没有布置过任何人藏武器，我也不知道哪里有武器。这些都由任传仲负责。（证明人：蒯大富）

8月16号，清华井冈山革命大联合委员会成立，两派才开始和工宣队一起正式收武器。（摘自1968年10月《文革履历》）

毛主席的7·28召见，及7·27工农兵宣传队进清华制止武斗的事件，成为重要的经验，陆续向北京市和全国进行了推广。

1968年8月1号，由北京市革委会印发成《京革发（68）100号》文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的决定”向北京市各单位正式传达。

紧接着，北京市各大专院校，不管是有武斗的，还是没有武斗的（例如，北航属于没有武斗的），都相继派出了工宣队，并推广到全国，逐渐平息了各地的武斗，清华成为工宣队制止武斗的成功样本。

7月31日我回清华后，主要的工作是收缴武器，组织宣传欢迎工宣队，帮工宣队找房子，解决办公地点等。1968年8月4号，在工宣队主持下，团派与414派达成了“八条协议”，由此开始了为期两周的清华两派最后的谈判，主要内容是交换俘虏和实现大联合。我是团派的主谈代表。

武斗虽然平息了，但如何处理和工宣队的关系，如何处理和对立派414的关系，成为团派面临的重大问题。1968年8月5日，蒯大富召开了团派总部扩大会进行讨论。就在当天，毛主席给工宣队送芒果，表示了对工宣队的支持。我在总部会上主张支持工宣队，和414搞大联合。有人反对我，他们觉得“工人像太上皇，受不了气”，蒯大富则叫大家“下决心和宣传队搞好关系”。这时，许多人关心的是“工宣队到底支持哪一派”？认为支持团派才是“支左”；“工宣队到底在清华还要呆多久”？还想着跟工人争夺领导权。团派那时与工宣队也仅只是想“搞好关系”，对工宣队在清华的定位感到模糊，对工宣队的倾向表示担心。蒯大富在会上强调“414太反动”，定下了对414的调子。这次会上，吴慰庭提出了对蒯大富7·28主席召见传达的质疑。也是在这次会上，定下了我是团派与414派谈判的联络代表，后来参与谈判的人轮换很多，只有我从始至终未变。我对这次会议作了记录如下：

◇ 总部扩大会1968年8月5日

蒯：今天讨论如何处理和宣传队的关系，搞好关系是有重大意义的。主席讲对414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鲍：清理阶级队伍放在大联合、三结合之后。注重政治。

任传仲：找底下战士聊。1、担心这次宣传队来搞半斤八两，怕支持414。倒不怕井冈山垮，只怕试点搞不成，主席战略部署实现不了。目前，摆在大家面前的两条路。（是两条路线斗争）：拥护不拥护宣传队。而宣传队也有两条路线：到底支左不支左，宣传队有没有坏头头，使群众有话不能讲，使群众采取消极态度。2、战士心里没底：到底宣传队是不是领导？搞多大规模，宣传队到底谁领导？好像谁都能插手。有些人灰心，回家了，出去玩

儿了。（抵触）3、怕宣传队有坏人，为什么把大厂，好厂都调走了。剩下的都是与我们抵触，死了人的。起码井冈山要有领导权。宣传队完全是一副领导的架势，造成好多人不愿讲话，干事情。4、依靠谁的问题，掺沙。（当时与工人结合称为掺沙子。）活思想：怕揪坏人，揪到自己头上。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想逍遥。对工人某些作风不满。

王良生：刘绍文讲宣传队可能住一个月。而清华问题要三月、半年、十年、八年解决。毛主席战略部署，不但要把清华办成教育革命典型，而且要办成制止武斗的典型。

吴慰庭：1、希望蒯全文传达主席指示，不要只传达对我们有利的。2、为什么现在“井冈山人”连标语上都不准写，到底是什么样的“沙子”。3、工人中66年毕业生也自称“大老粗”。4、有些同学有很多政治危险论，甚至有414观点：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想回家。

高季洪：我们不能和他们414半斤八两。大家对主席战略部署很高兴，但对很多问题不了解。我们和414是有是非的，什么都是派性不行。有一个大原则：应该相信宣传队，但要共同战斗中才能搞好关系。

张树友：到底对我们这三个月怎么估计，为什么出面的是工人，而实际操纵是卫戍区。414也要揪黑手。现在实际上是把“武卫”否认了。

邢晓光：宣传队内部传达是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吴炜煜：不能把学校的两派和工厂的两派混淆。

范希明：我们还要坚持原则。我们已经知道沈、罗集团是反革命，为什么还能让他们进革委会，要坚持原则。

周大卫：大家不明白1、什么是主席伟大战略部署。2、7·22，7·24，7·3，7·28。3、要明确谁领导。如果工人领导，我们就走。如果我们领导，我们就有权。4、到底怎样评价七·二七事件？5、今天战士拿到八条协议很不满意。

邢晓光：坚决不能走。1、解决清华问题。2、现在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宣传队有错误要批评，不能交给414。3、同学接触了大量现实，认为现在工人象太上皇，受不了气。4、不同意陈育廷意见。

翁文斌：现在要我们批判蒋南翔、旧清华，就必然涉及414问题，怎么能不互相攻击？

蒯：刚才暴露了很多活思想。三大步：1、下决心和宣传队搞好关系。2、大联合、三结合一起搞。3、同时清理阶级队伍。每一步要干净利落，拼命大联合不等于放弃原则。讨论三个问题：A、什么是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意义如何？B、工农宣传队进校是否根本上支持了团派？C、如何对待与414群众联合的问题。

马小庄：这个宣传队与三月份的宣传队是不同的。

蒯：414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是反动的，理论反动，中央表态很明确，两个月不准414贴标语。

战士思想工作：1、不能临阵逃亡，是主席伟大战略部署。2、若有坏人插手，更不能逃亡。

有利条件：1、中央支持。2、工人组成宣传队，对修正主义痛恨：什么“红线主导”？3、清华井冈山政治路线、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4、414头头太反动，是犯错误专家，肯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5、清华井冈山组织路线正确，有一支钢铁队伍。

几件大事：1、大量座谈。2、欢迎大会。3、海军宣传队要欢迎回校。4、组织人到几大厂贴标语、慰问。5、广播台、报纸要欢迎调子高。6、不准渲染丢东西，及宣传队与414好。

具体：1、各系马上建立班子，确立第一把手。2、组织各系队伍，叫外地回来。3、对414先斗争，适当程度与战士商量后让步。4、组织工人队伍修复房屋、水、电、大字报区，恢复四大。组织我校工人与宣传队工人谈话。5、树立正气，早请示，晚汇报，背老三篇。

落实：宣传：翁文斌、吴炜煜。大会：陈继芳、范希明。联络代表：陈育延、吴国发、张树友。贴标语：王良生、刘宗友。（摘自1968年8月5日工作笔记）

由于从1968年初海军宣传队进清华开始，解放军的宣传队已经几进几出清华园了。时间短，也都没起到什么关键作用，学校的权力仍掌握在学生手中。解放军宣传队一离校，两派照样打。因此有不少团派头头认为，这一次可能也不会例外，解放军宣传队是“流动的”，也许过一阵就会离开，学校的领导权还会回到学生造反派手中。孰不知这一次毛主席下了决心，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将会长期在学校待下去。因此，8341部队的迟群、谢静宜所带领的工宣队，从1968年7月27日开始，在清华一呆就是八年，直到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才离开清华园。学生们这一次对形势的估计错了，凡事走过了头就走向了反面。红卫兵们不搞斗批改，只会争权夺利打派仗，直至武斗。在文化革命中已经走过了头，走进了死胡同。不思悔改的红卫兵们已无法承担毛主席的重任，他们最后是自己走下了历史舞台。

〔作者简介：陈育延，1946年生于延安，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1970年毕业分配到贵州，1976年调进中国科学院，2001年退休。文化革命中曾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退休后致力于研究文革，现正根据文革中的日记、笔记等材料撰写回忆录，以期真实详尽地记录下清华文化革命的过程。本文是她回忆录中的一章。〕

□ 原载《史实与求索》第12期，2018年11月，〔原标题：“7月27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开进清华园，我亲历了武斗的结束和两派相反的态度”〕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